

在中國革命隊伍裏

(美) 尼姆·韋爾斯 (朝) 金
金山著

111

111

0423

988

Song Of Ariran

A Korean Communis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在中國革命隊伍裏

(美) 尼姆·韋爾斯 (朝) 金

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

Song Of Ariran

A Korean Communis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在中國革命隊伍裏

(美)尼姆·韋爾斯 (朝)金山著

江山碧譯・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

在中國革命隊伍裏

(美)尼姆·韋爾斯 (朝)金山著

出版：南 粵 出版 社

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六號二樓

印刷：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版

每冊港幣六元

斯諾著作中譯本：我在舊中國十三年

西行漫記（上）

三〇

（下）

七五

大河彼岸

八〇

漫長的革命（增譯本）

三〇

韓素音著作中譯本：早晨的洪流

——毛澤東和中國革命

第一部

第二部

二〇〇一年的中國
亞洲的風雷

八·五〇

五·八〇

一·五〇

一·四〇

目 錄

第二版前言	一
序曲	二
阿里浪之歌	二四
楔子	二六
童年在朝鮮	三〇
宣佈獨立	三八
東京求學時代	五一
渡過鴨綠江	五八
上海，流亡者的母親	六七
在中國大革命的隊伍裏	六七
廣州公社	八七

海陸豐的生死鬥爭·····	一〇七
上海重聚·····	一二八
在北京·····	一三三
回到東北去·····	一三七
革命婚姻·····	一四四
攀登阿里浪山·····	一四六
黨和個人之間·····	一六三
在病中·····	一六八
回到羣衆運動中來·····	一七五
又一次被捕·····	一八〇
兩位女子·····	一九二
朝鮮民族戰綫·····	一九九
跋·····	二〇三
譯者的話·····	二〇八

第二版前言

一九三四年，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諾和我從北京遷到約五哩外的海淀村居住，這裏接近美國贊助的燕京大學。我們一直在學中文，而這裏是人們依然講滿清君主政體最好的宮廷官話的地方（可是我們爲什麼要學宮廷官話，我現在可忘記了）。作爲學習中文和認識中國的一部份，埃德正編纂他的中國小說翻譯集《活躍的中國》，而我則爲它寫一篇題爲《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的論文。

埃德應邀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而我則在那裏修幾乎所有班級用英語講授的課程。我甚至上張東蓀講授的黑格爾中文課（自然，我的課本是英文）。我從中國主要學者之一許地山研究佛教、道家學說和儒家學說。在零度天氣中，我騎自行車到清華大學去聽中國哲學史課。我上特設的中國美學課，同時也研究中國經濟學和西方哲學史。當時約有八個西方人在燕京大學學習；我的同學之一德克·博德，後來以美國的中國問題主要學者知名，任教於賓夕法尼亞州大學。

從這時起，我經常替沃爾什主編的《亞洲》雜誌寫文章。（有一次我寫的文章幾乎佔去整一期雜誌的篇幅。）我用的筆名是「尼姆·韋爾斯」（那是埃德加·斯諾想出來的——「尼姆」在

希臘語裏是「名字」的意思，因為我有一部份威爾士人血統，所以稱「韋爾斯」。爲了不讓別人知道文章的作者是誰，這是必要的。燕京大學的學生把我寫的詩《古老的北京》〔註〕張貼在告示牌上，最初不曉得作者就是我。這首詩表達的正是我們大家的感受——活生生的死亡，悶得難受，暴風雨來臨前死一般的沉寂，一·二九運動的不可思議的氣氛。

這時，我們決定把家搬回北京去，租了奎家莊十三號半間凶宅，在那裏，埃德加·斯諾在靠近看門人居所的獨用工作室裏寫作《西行漫記》。

學生們繼續來訪，他們顯得悲愁、失望和迷惘。十三號的房子成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保育室，這個運動打破了「白色恐怖」。

在中國，一九三五年年底是法西斯主義的高峯。那時候，「白」區的共產黨機關遭到了破壞；在北京，許多人被關押或處死，或同法西斯主義者在一起以求自保。示威游行是非法的，學生們只要舉行一次示威（幸而沒有發生），就可能被處死；日本擺出了接管華北的姿態，包括北京在內，抗日活動是非法的。但由於傳教士控制着燕京大學，並且由於清華大學也有點西化（清華原屬庚子賠款辦的，並有美國基金），因此那裏的學生可以指望得到一些外國保護。

後來一二·九學生運動誕生了。它開始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走上左派道路。它像野火一樣燃遍全中國，並且通過要求結束內戰和成立抗日統一戰綫，標誌着對日本的最初抵抗。它是中國現

（註）這首詩最初發表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亞洲》雜誌上，後來刊出於艾倫·F·佩特的《雜誌名詩選集和美國詩歌年鑑》（紐約：詩歌編纂協會，一九三六年）中。

代史的一個里程碑。

一二·九運動由三位燕京大學學生發端，他們是：張兆璽，學生會會長（別人告訴我，他已去世）；黃華（王汝梅），經濟系學生，他一九三六年作爲翻譯同埃德加·斯诺一道前往西北（一九七二年他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首任大使）；以及陳翰伯，新聞系學生。一二·九運動的一位女勇士是周恩來的發言人——龔澎。她是一二·九運動的三位婦女領袖之一。（註）

這使我想起了金山。自然，雖然那時候我不知情，但他不僅在北京，而且甚至隱蔽在海淀，時間差不多就在我們居住在那裏的時候。當時他已經取得中國國籍，並且在「白色恐怖」最惡劣時期任北京中國共產黨的書記，雖然他活下來，但黨的機關却完全遭到破壞。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北京也許沒有同黨有聯系的共產黨員了，雖然有極少數幾個人可能出獄。我們認識的左翼藝術家都躲藏起來，或逃亡歐洲。

這是一個黑暗時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而當權。蔣介石請了納粹顧問來策劃打共產黨人。日本正打算接管華北。這是人性分高下的時期。

（註）我剛剛看了電視播映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的情況，在那裏，他的翻譯是南希·唐（唐聞生），她和她父親唐明照曾經是出席聯合國代表團的成員。南希的母親康斯坦斯·張在一二·九的示威游行中，對外國記者來說明星般惹眼的。我把康斯坦斯介紹給他們，說她是加利福尼亞州一個蕁草種植者的女兒（她的家人現在依然居住在洛杉磯）時，他們高興得很。事實上，作爲《密勒氏評論報》的駐北京記者，我需要多少篇幅，主編J·B·鮑威爾就給我多少篇幅，部份地因爲康斯坦斯是加利福尼亞州人。

時間是一九三七年年初。一位朋友帶來了消息：共產黨的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定於五月一日在延安舉行，軍政人物出席，這是一次空前的集會。

這時，我正處於我的文學生涯的頂端，我不想放棄它。這一年較早的時候，一位名叫J·S·肯納德的傳教士曾來訪。他籌了一千美元要辦份「應用基督教道德的雜誌」，他提出如果我們辦這樣一份雜誌去影響學生，就把這項工作交給我們。我同意從事這項工作。埃德答應把他寫的書在每一期上連載，並使用他拍攝的一些照片。我們給雜誌命名為「民主」：它要成為一個自由刊物，一個論壇。我們組成一個編輯部，成員主要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加之，我們的代理人亨利埃特·赫茨（我們工作中的一位真正伙伴）說，她要安排我的一本詩集出版。「民族」周刊要我當他們的駐中國記者。我收集了中國學生運動史、現代文學藝術史的資料，等等。生命對我來說是重要的，因此我一點也不想冒這個險或冒我身體健康的險。

但是，這位朋友帶來的消息是極其重要的。這樣一個好機會可能一去不復返。一九三六年，埃德派人叫我到西北去跟他會合時，我原來打算到保安去，但是我沒法通過封鎖綫，於是不得不從西安折回。這時，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召開的消息，使這次旅行成為迫切了。

一九三六年埃德從西北回來時，有兩支軍隊及其地區政府還沒有長征到達那裏。它們是朱德、賀龍、蕭克、徐向前等率領的第二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爲了收集我丈夫得不着的關於這些人的歷史性資料，我的延安之行是必要的，雖則他已經記下來六個人的自傳，包括毛澤東的自傳。他在保安時，只有毛統率下的第一方面軍長征到達。其餘的在一年以後才完成他們的長征，

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西北會合，那恰好在埃德離開紅區以後；延安是在十二月給攻下的。因此我覺得我必須到延安去；因為我去了（因為我設法在適當的時間裏到了適當的地方），所以我得到我的特稿：三十四個人生故事。

爲什麼我覺得無論如何都絕對必須作危險的延安之行，那是難以說明的；這是一種歷史感和必然性。我是一個探究事實、探究真理、探究歷史真相的旅行者。

此行是我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此後我就決不能從事「我自己的工作」，決不能成爲文學家了，這原是我的目標。我成爲一個寫別人的功業的作家，成爲一個替別人做好事的人，成爲一個尋常的做好事勤雜工。

上述一位朋友協助安排我的旅行，並和我一起乘火車到西安去，雖則我們假裝不相識。他是出席全國代表會議的華北共產黨代表。在西安，陳翰伯來看我（他和一二·九運動中我們的老朋友張兆璽在一九三六年已到了西安）。

陳翰伯那天一清早到來計劃協助我逃往延安時，天下着雨，我躲藏在一個倉庫的一袋袋小米中。幾分鐘後，那個警察局長就來到了（他已經搜查我整整一晚），安排七名特務和衛兵替班看守我。陳不得不秘密地逃往延安。我可沒有地方求助以完成延安之行了。南京蔣介石政府新近發佈了一道軍事命令，禁止任何新聞記者前往紅區。我是受到治外法權（即美國的法律，不是中國的法律）的保護的，雖然如此，軍事命令總應服從。

最糟的問題是，斯諾這個名字在西安是被詛咒的。一九三六年，埃德秘密前往紅區，發表了激怒蔣介石政府的訪問記。同樣，我也要還報前一年（一九三六年）我自己的西安之行，當時我

設法獲得我的記者生涯中最大的獨家新聞：陪同我到西安各處參觀的張兆璽，帶領我去訪問張學良少帥，他公開宣稱他贊成停止內戰，同紅軍合作抗日。因為他是蔣介石下面的第二號國民黨司令官，所以我的報道在《倫敦每日先驅報》（埃德不在時我處理他跟他們的通信聯系）發表後，震動了全世界的外交界——而在中國，則幾乎引起一場時機未成熟的「西安事變」（事變本身兩個月以後才發生）。因此，在西安，人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憑本身的資格的新聞記者，以及同埃德加·斯諾結了婚，因此我是雙重不受歡迎的人。

在我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西安之行中，少帥（這時他已被監禁）的友好軍隊已被調出西安，而蔣介石的法西斯當局正捲土重來，對丟臉（前一年我們的報道發表的結果）一事懷恨在心。別人告訴我，如果埃德竟會再次來到西安，他就會有生命的危險。所有這些使我驚恐，却也使我變得更加不屈不撓。

要不是兩位年青人的幫助，我就根本不會逃出西安的；這兩位年青人不贊成我的計劃，但贊成利用治外法權。其中的一位是埃菲·希爾，他是一位瑞典傳教士的兒子，而且是一個機械工。他弄到一輛屬於一個將軍的汽車，因此我得以通過軍事防綫。另一位是肯普頓·菲奇，他的父親喬治是全國基督教青年會會長（肯普頓現在依然在亞洲，為美國政府工作）；由於他不對這事件感到得意，我把他的名字保守秘密多年。他護送我到三原去，確信我路上安全而後已。若無他們，我連嘗試要作此行也不可能。我自己起的一份作用是，在戒嚴的時候從西安賓館的後窗爬出去，並避過了衛兵。

我在延安待了四個月時間。我一到達，毛澤東和朱德將軍就正式來訪，對我表示歡迎（這是

毛少數幾次正式往訪客人中的一次)。(註)

我送了一份長長的問題表給毛澤東，他有興趣解答這些問題。我同他交談好幾次。他答應給我提供充分的材料，寫一本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歷史的小冊子。我們在七月七日就這本小冊子進行了第一次談話；不巧那一天是蘆溝橋事變發生和對日戰爭開始的一天，因此他沒法繼續談這方面的事情了。

我受到作為「美國記者的妻子」的接待，受到作為集體中的一員的歡迎。朱德將軍及其妻子康克清特別不怕麻煩地使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們都稱讚我說：「你很勇敢。」

為什麼我如此受歡迎呢？為什麼別人告訴我如此多的生活故事呢？毛澤東是有關的一切的關鍵。他不僅欽佩埃德加·斯諾打破了歷時九年的新聞封鎖，而且對他產生個人的好感。毛創下了先例，一旦他滔滔不絕地向埃德加·斯諾談，其他的人就都仿效了。但對他來說，他們當中沒有誰是在講述自傳；這不是那時候的成規，也不是現在的規矩。可是因為他稱許埃德加·斯諾，所以毛澤東立即很好地接待我。

埃德加·斯諾和吉姆·貝特蘭在九月到西安來找我——那是在我從延安歸來途中離開西安四小時以後。日本已在七月七日發動了進攻，我則身困內地。在兇惡的潼關軍事檢查站，憲兵不經

〔註〕幾乎所有主要的共產黨領導人都這樣做，有時由朱將軍介紹。事實上，其中三位傳奇般的將軍在他們留在延安的幾天時間中，堅持幾乎每一天都來探望我——他們是徐海東將軍、羅炳輝將軍和蕭克將軍。這遠遠地超出了外交職務拜訪的範圍，它是人民之間的事情，因為這些將軍都是民間英雄人物，他們以前甚至幾乎沒有同外國人交談過。

解釋就把我拖下火車（這是我最驚嚇的時刻，因為我擔憂憲兵隊拷問或無痕跡地失蹤）。打電話到西安去，知道斯諾和貝特蘭在找我，於是我走回頭路。我持有特別通行證乘坐的軍隊列車遭到轟炸，火車頭和一些車廂被毀。

隨後吉姆前往共產黨前綫，為寫作《不可戰勝的人》一書收集材料。埃德則陪同我遠到青島，在那裏的海灘上，我們一起消磨了幾天時間。接着他就前往上海，採訪對日戰事的新聞，而我則回到北京去。

我從不指望活得太久，成為老古董。但是在一九五八——六一年，我為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彙編了尼姆·韋爾斯收藏品。然後在一九七二年，紐約市博物館的服裝研究所認為我的「延安涼鞋」和我在北京裁製、在西安穿着的藍色棉布長衫，有着永久的效用（可供複製）。那雙細繩（花邊）便鞋只在陝北穿，是當地的一位紅軍戰士在延安給我製作的。此外，我送給市博物館兩件竹工的背心。

長征途上，人們攜帶的東西是少而又少的。我擁有兩件主要的珍品——一面德國黑色薄鏡和一柄短劍，後者是在南方俘虜一個高級國民黨軍官時繳獲的。那柄短劍後來送給共產國際的德籍顧問李德（奧托·布朗），作為一種敬意。告別時他把那柄短劍連同他的鏡子贈送給我——而且是為了彌補整個夏天沒有和我親近。（六十年代，他依然在東德攻擊毛澤東。）此外，我還有一個戒指，用一顆喇嘛念珠製成，鑲了白邊。我在延安認識的羅炳輝將軍把這個戒指送給我時說，它是吉祥之物：戴上它，你決不會墮馬。他告訴我，那是長征期間一位喇嘛給他的。（後來我向毛說起這件事情，他笑着說，「我倒是希望給了他的」——意謂否則它可能被沒收。）延安的另

一件紀念品是我的褲子，那是爲外國人縫製的第一條。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埃德加·斯諾在瑞士艾辛斯他家中去世那天），我拍攝的三百張延安照片其中一部份在紐約市博物館展出，作爲一八七〇年至現在中國照片展覽的一部份。（這個展覽證明非常成功，期滿後繼續展出六個月。）

這些照片和我的延安筆記簿有着它們自己的經歷。當時我的難題是，怎樣在我的回程中使它們免被中國人或日本人沒收。在延安，我用一件男子汗衫製作了一條像救生帶的東西，縫了分隔空間，用來塞筆記簿和膠卷。在幾乎所有的緊要關頭，我都把它圍在我外衣底下的腰部。我戴着它進出西安，進出青島，進出日本人佔領的天津和北京兩次。最後，我乘搭沿海輪船前往上海，在上海碼頭上受到埃德加·斯諾和J·B·鮑威爾的迎接。當時，這個城市因受到日本人襲擊而依然在燃燒，但我却看到了慶祝勝利的游行。

不錯，延安有地方性鼠疫病；我居住的房間就有老鼠和蚤；斑疹傷寒並不是罕見的，熱病很普通。我的警衛員整個夏天都患活動性肺病（雖然我一時不曉得）。我的延安筆記簿的每一行都是用我生命的血液寫成的，每一張照片底片都浸透了汗水和淚水。但是我同歷史結合在一起，並且我了解歷史——爲了揚穀去糠，我曉得要做什麼事情。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埃德加·斯諾的去世，是美國在中國的經歷的一個界標。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他象徵着一種同美國人民的外交聯系。終其一生，埃德加·斯諾都注視着太平洋，無論如何都向美國人報告發生的情況。我們過着同心協力的婚姻生活，由一九三二年持續至一九四九年（在需要改變一下的時候我們離了婚）。我們分別於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探索了當時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但這是一個聯合計劃，兩者都不重複對方所做的情。

刻下我對毛澤東和延安所抱的心情思緒，是一種懷舊的心情思緒。要不是我體會到此行多麼重要，我是不會作這種危險的旅行的——回顧起來，它現在顯得比當時重要得多。幹革命的人把革命的來歷告訴我。

但我在中國的全部經歷中，沒有任何東西比一九三七年在延安那些下雨天同金山交談更富於見聞和認識。哪怕是在一九三七年，經歷了如此嚴峻的考驗和「白色恐怖」以後依然活着的人，是不多的。這樣的生活故事將不會再有人講了。

海倫·福斯特·斯諾

康涅狄格州麥迪遜

一九七二年二月